

当代承认话语的缘起·演进·指向

贾志雄

(河北工程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北 邯郸 056038)

[摘要] 当今时代,伴随着全球化的进程,人们之间的分歧、对抗乃至斗争日益凸显,而当代承认理论恰恰是适应时代需求并寻求解决之道的现实选择。所以剖析承认理论的历史演进和理论旨归,一方面有助于深刻理解承认理论的思想意蕴与精神价值;另一方面,也探究了人与人之间信任淡漠、道德缺失等“承认”问题的深层思想动因,进而为如何消解社会承认问题贡献了理论基础和价值导向,担负起构建共同体的文化支撑和实践导向。

[关键词] 承认;话语转换;道德

doi:10.3969/j.issn.1673-9477.2021.03.016

[中图分类号] B82-05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9477(2021)03-098-05

历史的发展有其独特、新颖、令人惊异的活动性的一面,但同样也有其变动不居的静止性的法则与态势,正如任何思想的出现都是时代发展的产物一样。现代承认话语的产生也照例有其深刻的时代诱因与现实诉求,它们都离不开当今社会发展的实践逻辑和理论探索,或者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恰恰是当今世界现实运动和思想探求共同作用下的产物。

一、当代承认话语的缘起

(一) 全球化时代谋求人类幸福的思想探索

承认问题、承认话语之所以引起人们的关注,成为人们思考和探讨的中心与热点,不外乎正是由于其反映和契合了当今时代的理论需求和现实观照。因为我们日益明显地感受到,在当今世界全球化浪潮狂飙突进的同时,人性冷漠、道德缺失和信任沦丧等问题同样让人触目惊心、不寒而栗。人与人、国与国、区域之间的分歧、对抗乃至冲突与斗争不时闪现或发生,并形成愈演愈烈之势。而形成这一困局与难题的因素很多,剔除我们熟悉的经济、政治、宗教和意识形态等因素之外,还有一个隐藏在这些因素背后的深层的、容易被忽略的文化动因,因为经济、政治、宗教和意识形态问题可以在明确的框架范围内形成某种程度上的妥协或共识,或为了共同体的利益、发展和命运,人们不得不摒弃成见和分歧,朝着发展壮大自己的目标前进。但这种基于文化认同上的差异则是根深蒂固和深藏不露的,但却又不时凸显出自己的存在,发挥着较显性因素更具差异化和独特性的作用,所以现实困境和普遍难题的出现,

恰恰映照了彼此之间承认的不足或缺失而造成的必然后果,这是对承认的否定或反抗形式,也就是由蔑视而引起的反抗与斗争,所以这一切问题的第一动因恰恰是“承认”不足或缺失的问题。有鉴于此,“承认”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演化为普遍性的世界难题,深深阻碍着社会进步和人类对美好幸福生活的追求。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阿克塞尔·霍耐特深切地感受到承认问题的现实价值和思想意义,并为之倾注巨大的心力,以期为全球时代人类幸福提供思想引领和理论导向。

(二) 批判理论对未来社会图景的深切期许

如果我们把批判理论做历时态分析,一条相对完整而清晰的印象会呈现在我们的面前,自从我们熟知的马克思社会分析和批判模式引起世人的极大兴趣以来,这一思想跳动的中心也在一直产生着某种与时俱进的问题意识和目标转向,总体来看主要体现为不断由物质领域到文化领域的转移。在法兰克福学派以文化为中心议题的批判视域中,归根结底是对现代文明的批判,对以工具理性为主导的全部启蒙理性的否定,这一传统到马尔库塞那里,甚至有非常明显的非理性冲动。体现出批判理论分析范式从关注启蒙理性到重视文化批判的运动逻辑。而哈贝马斯对工具理性的批判,坚持从理性的视角出发,把解决批判理论的规范性基础作为优先之举,转向一种开放性的以主体间性为中心的语言哲学范式。而当代的承认理论则舍弃了单纯批判的理论立场,聚焦于人们相互承认与蔑视关系的日常生活经

[投稿日期] 2021-07-20

[基金项目] 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编号:HB18MK006)

[作者简介] 贾志雄(1976-),男,山西河曲人,博士,讲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道德哲学。

验,把一种理想的主体间的承认关系作为批判理论的规范基础。在这一基础上凭借规范性秩序的重建,展示了对一种“善”的生活追求。并使之延伸到构建后现代共同体的社会团结领域,形成了多元主义的正义理论模式。

为此,合理解读和深入分析承认理论话语范式的转换和历史演进必将有助于深刻理解承认理论的思想意蕴和精神实质,使承认的思想视域和时代导向更加凸显而明晰,从而为深层剖析和合理消解现实社会中日益普遍的承认问题提供理论导引与实践导向。

二、当代承认话语的思想演进

当代承认话语的思想嬗变,既有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固有的传统理论积淀,又受到诸多关注现实命运的思想家们,如黑格尔、米德、福柯以及哈贝马斯在话题缘起、经验改造、方法借鉴和理论传承等方面的有益影响与合理借鉴^[3]。

(一) 耶拿时期黑格尔“为承认而斗争”的承认意识

“耶拿时期”严格意义上来说应该是青年黑格尔的后半期。这一时期,黑格尔思想变革和理论进化的因素主要来自两个方向,表现为两条思想脉络的延伸。其一他认为主体间的活动都无可争议地向对方提出自由活动的诉求,同时又使这种活动遵循有利于对方的准则而展开。也就是我们一般意义上所阐释的,承认是主体间互动作用的结果,并且形成一种个体之间相对平衡和合法的动态模式。其二是把承认作为人类社会化的核心观念纳入思维领域的中心^{[1]38}。

黑格尔在继承费希特和卢梭的思想智慧的同时,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基雅维利和霍布斯原子主义的“为自我持存而斗争”的社会冲突分析模式,从而打开了解析社会冲突理论模式的新视界——为承认而斗争。使斗争维度与社会承认的现实话语有机统一起来,并且成为分析社会冲突、矛盾、平等、自由问题必须思考的中心话题,而且在客观上使承认思维奠基于深厚的道德文化语境,而活跃于鲜活的现实社会生活情境,并且不断超越社会现状和社会制度的约束,成为一种导向交往和自由的实践社会制度关系。

在主体与世界交往之间的深层关系的阐释中,黑格尔重点以意指普遍权利为核心的契约关系为中心进行了分析。为此又不得不回到霍布斯的自然状态命题,但黑格尔更关注建立在契约基础之上的利

维坦,更多停留在预设之中,是一种虚拟状态,无法有效地解答竞争性社会环境下主体间的权利义务观念。黑格尔一再阐明自己对契约的独特判断与理解,并把它纳入社会实践的运动历史之中,在原始社会结构开始已有某种显现,黑格尔认为法的关系隐含在敌对竞争的关系之中,“对象根本上就是承认关系。个体财产被掠夺时的表现不是出于生存威胁的恐惧,而是出于交往对手漠视所激起的情绪”。^{[1]48-50}财产掠夺终归表现为一种敌对的冲突态势,但在客观上造就了主体间承认的法律关系。

此后,黑格尔在《精神哲学》中对交换价值、契约以及犯罪的反思性分析和探讨,大大拓展了法律关系的丰富内涵。并就通过这一现实事件窥视其深层的意识境界,黑格尔发现交换价值所暗含的主体间的共识精神和契约具象显现下的互惠性意识都带有某种法的关系的内驱力,因为契约无法自身保障其内在互惠性意识的顺利实现,所以对强制性约束的要求自然凸显,但强制约束的出现不可避免会造成受约束者个体自主性某种程度的伤害或产生蔑视感,而这也许会充当诱发犯罪的关键性驱动力。对此,霍耐特给予积极而肯定的评价,证实了黑格尔为承认而斗争在法律领域的复活而进行的深入思考与努力。霍耐特认可这类犯罪与生死斗争一样是主体诉求在法律普遍意识中偏离承认的产物。但黑格尔对犯罪的危害性认识止于法律制度层面,并没有把这种尊重个性、承认、团结的情愫贯彻始终。为此,霍耐特强调蔑视感的存在是犯罪发生的根本因素,而法律的存在却作用甚微,必须要纠正法律形式主义的错误。这也就暗示了霍耐特所期望开启的承认规范路径,也成为其承认理论所要追寻的价值目标。

总而言之,耶拿时期黑格尔的承认意识开启了规范和道德的关系维度,充分挖掘了霍布斯斗争理论的规范意义和否定价值,为霍耐特承认理论的展开提供了广阔的历史舞台,展示了承认理论未来发展的可能性形态^[4]。

(二) 米德对黑格尔承认理论的经验化改造

20世纪著名的美国社会心理学家乔治·H·米德,对人类主体同一性与主体间承认的情缘关系进行了最为彻底的自然主义创建与发挥。同时,他运用非思辨的经验心理学的方式,展开对人类特殊认识能力的研究。正如米德自己所阐释的“为了能够‘控制他者’的行为,行为者必须意识到自身行为对每一个互动伙伴的意义,而这种意识更具有本源性。所以社会心理学必须首先阐明这种意识出现的可能

性机制”。^{[1]81}米德一直以来都在实用主义和自然主义的思想框架内阐释为承认而斗争的理论构建,并以此揭示社会历史的道德发展现状,但这一思想路径竟然与耶拿时期的黑格尔为承认而斗争的理论构建具有某种不谋而合的默契与一致。

当然,耶拿时期的黑格尔承认学说的意义,更多体现在主体实践活动领域,而不是简单的在认识论领域长久驻足。对于这一理论领域的转换在米德思想中也有其独特的转向路径。米德主要借助于儿童道德判断的不同情境,对于这一主题给予经验性的说明和分析。米德提出一个“普遍化他者”,在此基础上产生我们今天所探讨的中心概念——承认。对于米德思想领域的这一转移过程,可以通过儿童社会化进程中,面对不同情境空间下不同规范性要求的普遍性程度,有一个更为具象而生动的表征。米德把儿童在游戏中的经历看作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儿童经历从“角色游戏”到“竞争角色”的转化和推进过程,这一过程相对于他者的行为模式和对参与儿童的角色规范要求而言,就是一个互动伙伴规范态度的内在化和普遍化,似乎有点黑格尔所谓的权力和义务关系的影子,所以正是米德思想中的道德—实践意蕴给霍耐特某种深刻的启示,使其坚定地断言了“米德对实践同一性构成的重建理解成青年黑格尔承认理论的社会心理学的翻版”^{[1]84-85}。

米德的“普遍化他者”构想在理论和实践两个不同的向度上对黑格尔的法权承认做出深化与推进,为承认运动注入心理色彩的光谱。并且通过具有自我内在持久冲动的“主我”和社会普适规范行为要求的“客我”之间的张力和冲突的辩证运动,从道德领域延伸到社会实践领域,并且创造性地把主我对共同体的回应与变革称作“创造性偏移”,并使之深入社会实践的全部进程之中。使内在化的普遍规范与个体化的独特诉求之间的张力构成的道德内驱力具有深厚的实践色彩,成为实践活动不断扩展、延伸的道德依据和道德诱因。当然,米德也充分意识到“客我”的独特性和存在价值。这种价值信念的存在客观上展示了主体能力的个人自我实现愿景。

霍耐特认识到了黑格尔和米德在某个视角上的一致性,那就是充分地理解到,社会文明的发展进程必然内置了个体性的解放与自由的因子。从个体的视角来看恰恰是自我持久冲动不断作用、持续扩展其共同体要求的产物,当然,在这一过程中文明的发展进程显现为一个为承认而斗争的过程。总之,米德运用社会心理学,展开的对承认理念的经验化改造和分析,为源自耶拿时期黑格尔的承认意识的

变迁与斗争奠定了心理基础和经验意识的土壤。同时,米德关于承认斗争的心理机制、自我实现冲动、创造性偏移等观念和思想为承认理论的未来的发展模式获得了心理分析维度上的生命力和创造性^{[1]77-97}。

(三) 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转型

法兰克福学派所坚守的社会批判理论有其固有的理论传统和研究范式,但当历史的脚步迈入其学派发展的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阶段时,由《启蒙辩证法》所开启的批判理论传统却在某些层面上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向,这一点在哈贝马斯的理论阐释中表现得尤为突出。由于哈贝马斯受实证主义和科学家协商精神的深刻影响,形成了科学研究过程也是一种交往关系的看法,强调实证科学在人类利用自然和保障人类物质生活层面的作用。运用诠释学的知识力量征服交往理论所依赖的主体间性。但诠释学自身也无法顺利证实人类一致的构成要件,所以也就无法探测人类自由所内置的客观性。所以,哈贝马斯选取了交往兴趣这种具有超验性和自由表达的观念知识来连接两种理性的具有反思特质的能力,与社会再生产中的自我形成相联系,使这一过程带有深厚的批判色彩。当然在自我形成中主体自主权的获得变得举足轻重,而其获取进程就是主体解除各种权威的制约与羁绊。再者,为了进一步深入探讨前科学的自我反省理论,哈贝马斯澄清了这一理论产生的现实基础,不是来源于一种有序的生活实践规则,而是对一种无压迫理想情景的深切期待,由此哈贝马斯转向了人类学领域,认为语言的理解中恰恰内置了他所期待的无压迫的条件储备、免除统治危险的自由的对话与动机,而这其中的自由理性才是哈贝马斯所言的自我反思的理论标准。

此后,哈贝马斯把自己的思想触角进一步延伸,扩展到人类历史领域,并且提出了对人类历史建构的两种情境:第一种情境下,强调目的理性活动和交往行动在社会行动领域的不同方向,并且使之居于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之中,使两者之间的分歧与冲突演化为人类历史的基本矛盾形式。而批判理论的主要任务就是批判游离于交往活动范畴之外的行为系统,这种行为系统由工具理性所设定,而且独立于社会理解之外。而在第二种情境下,黑格尔伦理生命的辩证法为哈贝马斯相互承认意志的产生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同时,哈贝马斯的主体意志的形成过程与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紧密相关。在这一进程中,历史的演进过程主要体现为一种社会群体间相

互协商与交往的互动,并处于一体化的规则和制度设定中,也就使制度设定中不同群体享有权力的份额不同,使社会群体分裂为不同的阶级,进而也产生了社会阶级道德斗争的形态。这种斗争源于对规则的不同理解和认识,所以,此时社会制度的调试就在客观上发挥了压迫和解放的双重意义,交往的进程也就演化为群体间在道德规范之上通过平等、自由交往共识形成具有超越色彩的意志。可是,令人遗憾的是哈贝马斯并没能贯彻自己理解的第二种情境,仅仅是对启蒙理性做了浅层次的交往理论转换。批判理论的基础也转向对人类交往生存的一般条件的理性重建,所以,在一定意义上也造成了批判理论走向普遍语用学的结局。霍耐特沿着哈贝马斯的道路,把批判的矛头指向政治和经济管理组织形式,并且深入挖掘其内在的深层依据和思想动因^{[2]303}。

(四) 福柯权力分析理论方法的渗透

众所周知,米歇尔·福柯是一位法国哲学家,但其现代性批判的研究视域恰恰契合和呼应了法兰克福学派的历史传统。霍耐特发现福柯的权力理论独具特色,它既不同于古典政治学说所推崇的契约论模式,也与马克思所倡导的国家权力理论大相径庭。福柯基于自己对发达社会主要融合机制的深刻理解和认识,引进了自己理解中的行动权力理论。在这一理论维度中,坚持权力系统的解中心化、去中心化,强调多元主体在不同情境之下的斗争行动并不是习惯思维中主权对个体统治的传统模式,而是基于主体间的策略行动之上所构建的权力结构,以及社会再生产进程。福柯权力理论一直对现代社会的融合机制问题给予足够的重视。为了突出其融合机制的与众不同,福柯也提出了生产力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规范”“知识”“身体”等理念,并赋予其独特的时代意蕴与历史价值。

随着时代的发展,福柯的研究思路发生了重大的变化,20世纪70年代以来,福柯开始在自己的历史研究中引入尼采的谱系学范式,使自己的研究目光紧紧地聚焦于历史主体领域。探讨存在于社会权力策略时空境遇下,道德与主体表象间在实践活动范围内呈现的样态及关系,并且为社会权力的功能分析提供了两种可能性的选项,其一是固定的制度模式;其二是无限增长的社会控制模式。在这两种备选,福柯对第二种选项情有独钟,也就是更加相信社会权力增长模式,从而实现社会控制最大化的成效。但要充分实现这些成效,福柯调动了规范、知

识、身体与权力技巧,使它们全方位结合。同时从历史发展的整体背景下,将机构前历史在规范、知识、身体三个方位呈现出来,并使规训的技术全面覆盖这些关系,造成权力功能化和匿名化更加显著。在这一进程中,权力施加对象也深入到自我主体的经验领域,规训法则是对身体实践行为进行训导进而造成了主体经验能力,这也就是我们熟知的“人类心灵的谱系学”。但霍耐特认为在这种系统理论中,社会斗争的作用被忽略了,经济因素也成为社会权力系统的背景,社会权力无限扩展主宰了社会进化的全过程,而且是通过行为者身体行为的控制,远远没有深入到心理动机的分析与探究,所以,归根结底是一种一维性的社会结局。但福柯理论的历史价值依然不容置疑,并且形成了自己的理论特色,充分肯定社会权力增长这一客观进程就体现为历史过程本身,而不需要其他要素,也不是一个自我持续异化的不断延续。虽然福柯的系统理论并不足以以为社会一体化奠定完整的理论贮备,但当这一理论发展与哈贝马斯的主导方法社会交往理论相结合时,才为批判理论的交往模式转型奠定了必要的基础^{[2]198-200}。

当代承认话语基于一种历时态的宽广视角,详尽阐释了基于不同时代背景和思想视域中承认的原始意蕴和历史范式,既深层次地回应了现实社会发展日益凸显的承认问题产生的历史依据,又使承认理论的思想性和阐释力日益宽广与深刻,并在时代的延伸中不断丰富自己的理论内涵和思想张力,以顺应时代发展的现实之需,进而引领社会历史运动中承认问题合理消融的理论路径和现实选择,也成为当今全球化时代背景下,直面不同区域、不同族群间的承认意识淡薄和彼此对立问题,并为其合理消解提供可资借鉴的理论参照和未来导向^[6]。

三、当代承认话语的共同体指向

由此我们发现,当代承认话语的生存境遇就是直面当今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现状,从我们面对的现实环境出发,以主体间深层的相互“承认”为起点和思想线索,去洞察和研判人类未来的前途与命运,寻求一种符合人类共同需求和美好生活的活动形式——共同体。这种共同体秉持一种积极的、乐观的、自信的态度,以及对现代社会的极大热情和人类未来发展的高度自觉,凭借以承认为基础的规范性的重建,重燃人们的理想之梦,也为人类打开了一扇挽救当前时代危局,走向实现人类平等、正义和美好生活的可能性之门,以期实现“善”的共同体价值

追求与目标设定,成为共同体持续推进的道德支撑和文化引领,在人类思想价值深处发挥导向性和支配性的作用。

当然,共同体作为当代主体间承认关系模式的第三种形态,其同样显示出几多理想色彩和正义诉求,是其企图借助承认理论实现对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论争的积极回应和超越的理论尝试。既关注到人类自我实现的条件,又时刻联系社会生活实践的前提。这种共同体是在充分考量和评估个体能力与个性特征的基础上,主要运用团结的内在规范结构模式来构建,既有共享价值目标又实现个体自我,也是个体自我实现和共同体价值评价两个相互促进的辩证运动过程。当然在这之中,体现共同体规范的团结深深地打上了情感的烙印。所以这种团结不是一味的消极容忍,而是因深深的对他者的同情和关心才体现出共同的目标。当代承认理论对正义原则的坚持并不意味着其放弃了现实社会生活中权利平等的一贯主张,只是其在认识和分析现代,乃至后现代社会事务不再仅仅停留于平等的层面,而是深入到多元正义的宏观背景之下来分析社会分歧与冲突,进而依据其承认的道德关系规范构建适合未来人类发展需求的共同体形式。

所以,我们理应密切关注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界的“承认话语”在思想引领和规范重建中的巨大价值和引领作用。首先要大力挖掘和传播“承认”文化与“承认”思想的深层价值和未来使命,使“承认”的思想意识成为主体活动之间的首要意识和思想共识,成为思考未来理想前景模式的思想基础和文化准则;其次顺应承认话语的思维路径,使承认的思想意识从道德哲学向社会各领域延伸,建立一系列基

于承认基础的机制体制,以使共同体在一定群体或在一定范围内成为现实存在和实践选择,发挥其示范效应和实践导向。当然,我们也应清醒地意识到,理想共同体模式的出现与形成,并不会是单纯某一理论和思想之力就可以实现的人类梦想。需要发挥人类的集体智慧和聪明才智,需要汇聚更深层、更广泛、更进取的思想智慧与奋斗实践,是诸多前瞻性、未来性思想理论共同作用的结果。所以承认话语的理论价值和未来导向值得我们去深入研究与大力弘扬,以使其理论指向和实践价值得以充分、全面地体现,充分发挥其在构建共同体使命下的思想魅力与行动指南,在更深的层次和更广阔的程度使共同体理念与模式更具现实性和可操作性,指引当今的世界走向更加光明的前景。

参考文献

- [1]阿克塞尔·霍耐特.为承认而斗争[M].胡继华,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
- [2]Axel Honneth. The Critique of Power: Reflective Stages in a Critical Social Theory [M]. Trans. Kenneth Bayne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London: The MIT Press, 1991.
- [3]王凤才.霍耐特承认理论思想渊源探析[J].哲学动态, 2006(4):57-62.
- [4]陈良斌.承认哲学的历史逻辑:黑格尔、马克思与当代左翼政治思潮[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50-70.
- [5]阿克塞尔·霍耐特,南茜·弗雷泽.再分配,还是承认:一个政治哲学对话[M].周穗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 [6]丰子义.发展的反思与探索——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当代阐释[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150-163.

[责任编辑 李瑞萍]

The Origin, Evolution and Direction of Contemporary Recognition Discourse

JIA zhixiong

(School of Marxism, Hebei University of Engineering, Handan, Hebei 056038, China)

Abstract: In today's era, with the pace of globalization, people's differences, confrontation and even struggle are becoming increasingly prominent. The contemporary recognition theory is precisely the realistic choice that adapts to the needs of the times and seeks solutions. Therefore, on one hand, analyzing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and theoretical purpose of recognition theory helps to deeply understand the ideological meaning and spiritual value of recognition theory; On the other hand, it also explores the deep ideological motivations of the "recognition" issues such as indifference in trust and lack of morality among people. Furthermore, it contributes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and value orientation to how to resolve the problem of social recognition, and assumes the cultural support and practical orientation of building a community.

Key Words: recognition; discourse transformation; morality